

钱玄周

CHINA MODERN
PROSE CLASSICS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

大家文新出版社



钱玄白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

CHINA MODERN
PROSE CLASSICS

大象文艺出版社





圆孰是孰非”同样的可笑了。讲到本校，国语文的开始教授，与注音字母同时，更远在教育部通令“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授国语”之前（那是 1920 年的事）。这几年来蒸蒸日上；高年级的生徒，大率都有文学的嗜好，所做的白话文，颇能为细致的描写和曲折的叙述，迥非那颠来倒去地读那几十篇唐宋八家的古文而做不通的《汉高祖论》的不幸的生徒所能企及；低年级的生徒，也能做很稚气很天真的儿童文学（的确配得起称为儿童文学），也断非那入学数年而提笔写信便要抄《酬世书信大全》的不幸的生徒所能望其肩背。关于这一点，本校自问实在很对得起社会。年来一班脑筋昏乱的人们，鬼鬼祟祟地干开倒车的把戏，务吹古文的死灰，冀其复燃；近月来妖氛毒雾更弥漫于空间，国语运动的一线曙光，几乎要被它完全遮蔽了。本校际此白昼晦冥的时候，更宜努力宣传国语文学，以端学子之趋向。

（3）提高法语和英语的程度学问本无国界可言，语言文字只是表示事、物、思想、道理等等的工具。某字某语对于某事某物能够表示得恰合，便是适用的工具。凡适用的工具，人们都可以自由拿它来利用，实在也没有什么国界之可言。譬如日ㄣ（人），ㄇㄣ（man），ㄊㄇ（homme），ㄈㄊㄇㄊ（homo），ㄈㄎㄊ（ㄟㄊ），这都不过随便拿某声某韵来表示咱们这一种动物而已。它们对于咱们，都能表示得恰合，咱们本可以随便拿它们中的一个来表示咱们。中国人非不可说ㄊㄇ，法国人非不可说日ㄣ。其所以事实上不是如此者，不过因为中国人说惯了日ㄣ，法国人说惯了ㄊㄇ，所以觉得那样说法较为便当些罢了。并非中国人说了ㄊㄇ便吃不成饭，法国人说了日ㄣ便吃不成 Pain 也。所以寻常日用的词儿，彼此各有习惯的，自然不必故意去



改作（例如中国人改说ㄗㄣ）。但学问上的词儿，却都是外国有而中国没有的（因为现在成系统的学问都是外国人发明的），我以为这就应该用外国的原字来补充，断不必瞎费心思，去闹什么译名的问题。因为那个外国原字早已“约定俗成”，所以含义恰当，我们采用它，比起什么“义译”、“音译”来，又省事，又明确；而且这样办理，才能和世界的学术契合无间，若水乳之交融。说到这里，我的意思可以干脆地说出来了。我认为中国今后至少应该有一种外国语和国语同样看重，就是看、读、写、作的工夫都做得很纯熟很自由的地位；换言之，就是把这一种外国语看成“第二国语”。本校的外国语，自来即用法语；蔡子民、李石曾、沈尹默诸先生都是希望本校生徒具有很高的法语程度，能够自由看书，能够直接从法语的书籍中研究世界的新学问新知识。这个意见，我以为很对的。近年来，本校又添授英语，使学生更多认得一种直接研究世界学问的语言文字，这更好了。我希望本校教授法语和英语的先生们，今后更将外国语的程度提高，务期学生们能够达到直接从外国书中研究学问的目的。

（4）编纂国语和历史的读本上海各书店出版的国语和历史的读本，一言以蔽之曰，都是对于低能儿的教材而已。越是低年级的国语读本，文句越简得不成话，意思越干燥无味，爱说呆话或无聊的道德话。如“早起，开门”；“太阳出，拿书包，上学堂”；“小猫三只，白布五匹”；“狗比猫大，猫比狗小”；“一个人有两只手，这是左手，那是右手”；“人有手，猫没有手”；“哥哥吃大梨，我吃小梨”；“放学回家，见父亲，鞠躬，父亲欢喜”；还有什么“司马破缸”，“陆绩怀橘”；甚而至于什么“乌反哺”这一类毫无科学根据的鬼话，还要照例胡说以教孝（！）。历史



读本，专选那些“邻猫生子”的材料，只看见许多人名，地名和纪年。殷朝一代，只用一百多字记载，而“殷衰，殷复兴，殷复衰”这种句子占了不少。两三行记一个孔丘，而什么“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道德为万世宗仰”这些话都有了。老实说吧，我是曾经做过八股的人，什么《左传》、《史记》、《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都曾翻过的，看了那些教科书中简短的叙述，也还要摸不着头脑ㄋㄟ！给现在中小学校的生徒看，但们能够得到什么印象！还有什么“伏羲画八卦，黄帝伐蚩尤，尧舜揖让，禹治洪水”，这些荒诞不经的神话，还是像杀有《彖》事地编在历史上。这种国语和历史的读本，不但读了一无用处，而且必至愈读愈呆！本校虽不全用它们，但因未曾编纂适用的，所以现在还不能全不用它们。我希望今后本校聘请数一数二的头脑清楚、学问渊博、思想超卓的学者如顾颉刚先生等来编几部好的适用的国语和历史的读本。

对于学生也有四个希望：

(1) 有科学的头脑这所说的，不是专指自然科学而言（自然科学，当然应该有许多人来研究，尤其是青年学生们，因为研究自然科学，一层是为利用厚生之预备，一层是为科学头脑之训练，这两层都是今后中国极切要的），非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们对于一切事物，一样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智，条分缕析地研求它的真相。这样的研究日积月累，知识日增，智慧亦日进，对于不根的传说，谬误的行为，不合理的组织等等，自然会感觉到改革之必要。道德的修正，社会的改善，全基于此。由这条路出发的修正改良，才是站得稳的真正修正，真正改良。否则凭一时的冲动或一己的幻想做出来的，所修未必正，所改未必良；即



使偶正偶良，只能算做幸获，这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靠不住的。可怜中国古人，最缺乏科学的头脑，所以二千余年以来，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学者（就是这几个人，也免不了常要胡说），都不肯把事物条分缕析地研究，老爱闭着眼睛，信口胡说，听的人的头脑也同样是昏乱的，所以有人妄言之，他们便妄听之，而且妄行之，于是便糊里糊涂地定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谁碰它一碰，谁就罪该万死。这样胡闹了二千余年，所以现在道德卑污到了极点，社会腐败到了极点。挽救这个颓局，其责任全在青年学生的肩膀上。青年学生的头脑若再昏乱，中国便绝无挽救之可能了！但我看近年的学生的头脑，颇觉有些不能放心，尤其是有文学嗜好的青年，更不肯运用理智，考察事物，这是大错的！本校学生，有文学嗜好的很多，我恐怕他们也误入迷途，所以有这一个希望。

(2) 有文学的手笔有一种人的议论最可笑。他们说：“我们是学科学的，文学与我们无干，我们不必会做文章。”于是他们不但不留意文学，连文理都不管了。结果，他们编译的书不但干燥无味，竟至文理不通，白字连篇，叫人读不下去。这个见解实在是很谬误的。我以为研究科学的人要是对于专门的文艺没有兴趣，自然无研究它之必要。但记述科学的文章，文理总是应该通顺的。而且因为科学的材料或过于高深，或过于枯燥，所以还应该看看文艺书，学得些美妙的文笔，来做关于科学的文章，才能引人入胜。试举我自己的经验为例。吴稚晖先生所做的《上下古今谈》和吊正先生所译的《常识之基础》（登在《第一小报》上），同样是讲科学的。但我读前书，每读总不肯放手，读了内容很容易记得，而且读时感到很大的愉快；读后书，勉强看完数十行，便觉昏昏欲睡，它讲了些



什么话，我一些也记不得。其实吊正先生的文章绝不至于不通，不过“非文学的”罢了。吴先生著作的好处，就是因为是“文学的”。我最佩服胡适之先生一句话：“文学不过是最能尽职的语言文字，因为文学的基本作用（职务）还是达意表情。”本校的学生们大率都有文学的嗜好，似乎不至于犯这个毛病，但我恐怕有人中了“记述科学无须用到文学”这句谬论的毒（更有人以为“记述科学不应该用文学的手笔”，这话更谬），所以这一点也列为希望之一。

（3）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青年学生对于古书可看与否和应看与否，成为近来一个问题，我对于这问题的意见，曾经简单地写出几句，登在本旬刊的第二期上（《青年与古书》），可以不用再提了。现在要仿章实斋“《六经》皆史也”这句话的口吻，说“古书皆历史也。”用了历史的眼光去看古书，则对于制度的由来，文化的迁变，方能弄得明白。把这些弄明白了，可以得到两个好的结果：一是知道现在不适用的，在过去的某时代或者是很需要的，这样，便能够还它在历史上的价值，不至厚诬古人；一是知道在前代很有价值的，到了现在，时移世易，早已成为僵石了，无论它在历史上有过怎样的大功效，今天总是万万不可再请它来“复辟”的，这便不至陷害今人。本校学生，因为有文学嗜好的较多，所以前此研究历史的极少（或者竟可以说是没有）。讲到某人研究什么学问，我是主张完全要用自己的兴趣来决定，万不可由别人用了功利主义做标准来“指派”。但我却希望（不过希望而已）本校学生中有研究历史的人。要是有这样的人，前面这几句话便是对于但研究历史时的希望。（研究历史并不限于古书，这里不过单就古书说说罢了。历史的范围大得很了，研究它的范围大得很了。）



(4) 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诚一个人的衣食住以至所谓精神上的需要等等，处处都离不开别人，所以互儿互女互去互的互助论，实在是发明人类（不止人类）生存的真理。因为如此，所以个人对于社会是应该尽相当之义务。所谓尽义务者，便是用自己的聪明材力做出许多成绩来贡献给社会使用。成绩虽有种种之不同，而为造福于社会，帮着社会向着进化的历程上多走了几步则一。所以个人对于像样的社会，应该努力使它更好；对于糟糕的社会，应该努力使它日渐变好。中国现在的社会，可以说是糟糕到了极点了，努力将它推翻，改造，实在是咱们最重要的事业。这个事业虽在将来，但现在不可不豫立此志。现在所求的知识学问，都是为他日改造社会之预备（改造自己也包括在内，就社会全体言，自己也是社会之一员）。因此，所求的学问，应该是合于进化，近于真理的（绝对的真理，非吾人所能确知，故只可说是“近于”），而不是那谬误学问。近年来中国的青年们常被两种很误谬的见解能所惑。一是以为我们求学，专是为自己吃饭之用的。所以凡可以骗饭吃东西，便应该学习，他们恨不得把学校的学生都变为商店的学徒。他们听见别人讲几句有关于人生进化的话，便目为高调，因为这是骗不了饭吃的。这是所谓“职业主义的教育”。一是以为我们求学，专是为发挥狭隘的爱国心之用的，他们最崇拜日本和过去的德意志帝国那种血腥气的爱国主义。所以他们妄夸己国，厚诬他国。中国人本来就是患夸大狂病很深的民族，现在国货上面再加上这种劣等的洋货（这真是我们应该绝对排斥的“劣货”！），于是凶兽吃人的面孔更显露了。这是所谓“国家主义的教育”。青年们受了这两种教育的毒，实在是中国前途的大不幸，因为这是把中国人驱出进化轨



道以外的教育。我希望本校的学生们别受他们的蛊惑。咱们应该向着进化的路程上努力干改进中国社会的事业。

一九二五，五，十五。

（本篇发表于1925年6月11日《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6期。）



关于反抗帝国主义

“反抗帝国主义”这一句话，空嚷了几年，这回“五卅惨剧”发生，反抗帝国主义的实行期便从此开始了，罢课，罢工，罢市，对外人抗议，对民众演讲，主张与英日断绝经济关系，建议派兵保护上海租界上的市民，……这自然都是当务之急。讲到帝国主义者历来对于咱们的侵略行为，和咱们现在对付这回事件的种种办法，近日报章杂志上论述甚多，我大致看过一些，都觉得很好；我并没有什么特见可以发表，所以不来赘说。

现在要说的，乃是忽然记起以前见过的两句口号，叫做“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从这口号里引出的一点意见。（这两句口号出在哪里，这八个字有无错误，都记不真切了，反正这没有什么关系。）

帝国主义者对于咱们施行政治的和经济的侵略，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关于这一点，可看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第二讲，他叙述此事，最为简单明了。）咱们被人家侵略，绝对的不应该投降，绝对的应该反抗。这是天经地义，不容丝毫疑惑的。这回的事，起初是青岛的日本纱厂惨杀中国工人，后来是上海的英捕房惨杀中国学生及其他，所以现在就事论事，大家都专心一意的反抗日英两国，专心一意的反抗他们这回杀人的事件。将来反抗的结果究竟怎样，现在谁也不能知道。但即使“如天之福”，现在学生联合会等等所提议的种种条件竟办到了，难道反



抗帝国主义这件事就算做完了吗？不然！不然！绝对不然！不但不能算做完，简直还没有动手ㄋㄟ！帝国主义者，岂仅英日？侵略的行为，岂仅这回杀几十几百个人？政治的经济的层层压迫，若没有亿兆分的努力反抗，而妄想轻轻松松的解除，天下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所以我认为反抗帝国主义，简直是咱们中国人今后毕生的工作。

这回的事件将来结束以后，凡有脑筋的人们都应该努力去干一件工作。这工作便是“唤醒国人”。这被唤醒者应该是国人全体，并非限于一般所谓民众。唤醒者自己亦当在被唤醒者之列：一则凡述说真理，针砭旧锢，本非专为谴责他人，责人以善，其实也是忏悔自己，改善自己；二则天下本无万能的人，A 事甲为唤醒者而乙为被唤醒者，B 事则又乙为唤醒者而甲为被唤醒者，所以是互相唤醒，无论何人，决不应自居为全智全能全善全圣之上帝，而超然于一切人们之外。因为被唤醒者是国人全体，所以“高调”实有“唱”它之必要，而低调也得要唱它一下子——举个例说， $\Gamma\cup\Delta\Gamma$ 和 $\Delta\Gamma\cup\Delta\Gamma$ 诸人的学说应该介绍，而放脚和剪辮的话也得要说。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老爹这三句话，真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帝国主义者侵略咱们，咱们固然应该反抗他们，但断不可一味的愤恨他们来侵略，应该自己反省一下子：“为什么他们不侵略别国而来侵略咱们ㄋㄟ？为什么咱们以先称为‘洋鬼子’的，一旦他们兵临城下，咱们竟会那样不生心肝，不要脸皮，乖乖的高呼‘洋大人’（那时便要敬避违碍字样而改写为‘洋□子’了），双膝跪倒，摇辮乞怜ㄋㄟ？”呜呼！“为是者，有本有源”ㄋㄟ！咱们要知道！咱们以先本是“做奴才”！ㄟ！咱们的不肖祖先编



纂许多《婢仆须知》，使“家弦户诵”者二千余年于兹矣（再以前“书缺有间”，不能确知，但决不会反比后来高明，这是可以武断的）。这种奴才教育浹髓沦肌，自然异族侵入，甘为洋奴西崽而不敢辞——实在是义不容辞。是个国民，才有处理政治之天职，奴才配有吗？是个国民，才有抵御外侮之义务，奴才配有吗？二千余年以来之中国人，既束身于《婢仆须知》之中，则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固其所也。古之帝国主义者五胡、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族“提兵入关，定鼎中原”，该奴才们既已高呼“圣天子”矣，则今之帝国主义者条顿、拉丁、盎格鲁撒克逊、斯拉夫、大和诸族施行政治的和经济的侵略，该奴才们高呼“洋大人”正是当然了。

《婢仆须知》之教育交了二千余年的好运，到了二十世纪开始，忽有孙中山其人者不肯“安分”，实行“犯上作乱”，立志放奴，创为“三民主义”，有志竟成，居然满清给他推倒，民国给他组成；极少数之被他唤醒者于是对于今之帝国主义者也起了反抗之志，这自然是可喜之事，但这不过极少数而已。大多数之国人沦于奴籍者有年于兹，实在不容易振拔，所以他们表面上虽然也算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骨子里还是满清帝国的遗奴（他们之中有反对满清者，则是汉唐宋明的遗奴）。因为奴才本没有处理政治之天职和抵御外侮之义务，所以他们不管这些事，所以像这回的惨剧发生，极少数人嚷得力竭声嘶，而他们不是置若罔闻便是莫名其妙。这固然令人气破肚，但实在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原是读《婢仆须知》出身的丫。

但是他们如此糊涂，可真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因为长此不变，不但他们将永沦奴籍，万劫不复，即此极少数人亦终必陪着他们去送死！所以唤醒国人，实为今后有脑筋



的人唯一的工作——救命的工作。

怎样去唤醒国人？自然其道多端；上文说过，高调低调都得要唱。但无论唱高调低调，基本观念只有一个，便是“将《婢仆须知》撕破，践踏，焚毁”：——这是我所谓“内除国贼”。

编“内除国贼”这句口号的人所谓“国贼”，当是指军阀政蠹而言。军阀政蠹自然是国贼，但我觉得不值得特别去提他们，因为他们非由天降，非由地出，固来自田间也，军阀政蠹一旦倒了运，与普通国人固无以异；普通国人一旦走了运，还不是十足道地的军阀政蠹吗？那么，不唤醒国人，不改良国人，而徒沾沾焉惟军阀政蠹之是骂，真舍本逐末之论也！而况军阀也常要滑稽的骂军阀，政蠹也常要滑稽的骂政蠹。他们自暴其丑给我们听，我们只消点头微笑道，“丕！原来如此！”就尽够了。

凡与中华民国国体政体和一切组织抵触的，都是“国贼”，都应该“除”它，而且“除恶务尽”！试举数例：什么纲常名教×丫，什么忠孝节义|丫，什么文圣武圣兀丫，什么礼教德治丫，什么文以载道×丫，什么元首小民ㄋ丫，什么安分守己|丫，什么乐天知命兀丫，什么不问政治丫，什么“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丫，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丫，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兀丫，什么“济人利物非我是，自有周公孔圣人”ㄋ丫，…………种种屁话，都刻在《婢仆须知菁华录》上，有一于此，国即不国！这些国贼，本应该在民国纪元前一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那天宣告死刑，本应该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那天执行枪决。何以故？因为它们都是专制帝国的保镳者，而绝对与共和国相抵触故，只因当时任它们逍遥法外，以致十四年来所谓





们对于中华民国，感情非常淡薄，甚至还厌恶他，仇视他；而对于有害于咱们的“鸟国粹”，反拥护之惟恐或失。他们对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能够忍受，甚至还信用他，仰赖他，而对于有益于咱们的现代的文化，反排斥之不遗余力。这种颠倒是非的现象，便是亡国灭种的根苗！

我现在再说几句话来结束此文。

不爱中华民国，国必亡！甘愿托庇于“洋大人”之胯下，国必亡！守住已死的“鸟国粹”，国必亡！拒绝现代的文化，国必亡！要不亡国，除非由有脑筋的人们尽力去做“唤醒国人”的工作，使国人把这种亡国的心理反过来。

一九二五，六，八。

（本篇发表于1925年6月15日《语丝》第31期。）



敬答穆木天先生

穆先生的信虽然是写给启明的，但全信的话都是为我而发，所以这篇的题目叫做《敬答穆木天先生》。

穆先生信中对于我用了不少的俏皮字眼和语句，乃至以我的名字为戏，这些我都不介意，而且觉得有趣。惟有一处我不能不提出抗议，因为这太叫我难受了，便是“堂堂的钱玄同先生——中国的学术界的泰斗钱玄同先生”这个称号。鲁迅说得好：“……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漫骂。我总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藉此来束缚你的言动，……”（《猛进》第五期通信。）“堂堂的”的丑相何等肉麻！“泰斗”究竟一个铜子儿可以买几斤！玄同虽不学，尚不愿以此自污！

闲话表过，且谈正文。

我敬告穆先生，我是否是日本所谓「*門下虫*」一流的人，我自己不知道，可是穆先生给郑伯奇先生那封诗体的信（3月6日《京报副刊》），我的的确确是“完全未看懂”，我的“真好眼力”是这样，我也没法。——但我也还不甘心安于“真好眼力”，我今天把《京报副刊》上所载穆先生的信检出来，再逐字逐句地细读一过，还是“完全未看懂”，大概我实在是“一辈子不能懂讽刺一流的东西”了。

不但此也，穆先生今回给启明的信，我尤其看它不



懂。穆先生给郑先生的信中有“我们要歌颂盘古的开天，轩辕的治世，乌江夜里的项羽，努力实现的仲尼”等语，又引孔老二“关雎乐而不淫”这句话，我认为这是凤举所说的“凡是我的或我们的都是好的”的意思，固然是“完全未看懂”，但我自己觉得这还不失为“望文生训”。至于今回的信中，说了许多“国民文学”。“国民的”，而又力言与“爱国论者”不同，也不是要“复活国故”，我不知道这“国民的”既非历史上的故物，到底是什么东西？若说把现代世界文化（即所谓欧化）普及到中国来，换言之，便是中国亦沐浴于世界文化之中，亦即梁漱溟先生所谓“全盘承受欧化”，这是我所极端主张的，但这决不能说是“国民的”，因为既非咱们所固有，亦非咱们所独有。我看穆先生的语气，他所谓“国民的”，决非指此而言，可以不论。据我的猜想，穆先生大概与郭沫若先生的见解相像。郭先生最爱把自己的理想装在古人的尸体上，如女媧、伯夷、叔齐、孔老二、聂政、王昭君、卓文君、王实甫、王阳明这些人的尸体，都是被他利用过的。这个方法，“古已有之”，即所谓“托古改制”是也。用此法来做诗歌、小说、戏曲，则可；因为这不过是借用几个古人名字，等于杜撰孙行者、林黛玉、杜少卿、多九公这些假名字，这不过是借用几件古事，等于完全虚构事实（我的偏见，则以为杜撰名字与虚构事实，比借古人古事更好）。若竟认为实事，以为这几个古人的确如此高明，再把它放大，普及，说凡古人都是如此高明，便认为咱们有如此的好祖宗，真是荣耀得很，为子孙者理合歌咏先德，发挥光大，这便不然了；因为这种“民族魂”是几个文学家关了房门，用幻想造出来的，并非“我们民族历史”真是这样，真有这回事。所以假使我猜得不错，穆先生确是“要